



安阳县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序

中共安阳县委书记 王社民

斗转星移，岁月奔流。随着千年更迭，世纪交替，人类社会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2002年。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作为向中共十六大献礼的《安阳县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是政协工作的一大成果，是文史工作者辛勤劳作的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并亲手扶持起来的工作，是富有政协特色、有严格工作规则和具有重要统战意义的存之长久、大有前途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人民政协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政协发挥自身优势的重要天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史料学的新拓展，是建立史学大厦的重要构件和重要基础。这项工作与社会相映并存，与历史同步前进。

安阳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文史资料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我县文史资料工作扎实而富有成效。政协老一辈文史工作者坚持“亲历、亲见、亲闻”原则，团结社会各界人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卓有成效地发掘、抢救、整理、出版了一批辛亥革命后至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史料。现在的政协文史人员正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在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在继续抢救建国前文史资料的基础上，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国后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方面，这不仅是工作的连续，更

是一个进步和飞跃。至目前，县政协已出版了十一辑、约二百万字的文史资料，有效地发挥了文史资料的团结统战功能、教育启迪功能、借鉴参与功能和研究印证功能，在全县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本辑文史资料共收集文稿 39 篇，25 万字，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有的对时间、事件记述确切、详实，如郭静安撰写的《城工部轶事》；有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伟人、名人、政治人物，如吕何生撰写的《地质学家郭文魁》，张庆云撰写的《袁世凯及其家丁祸害安阳民众的几件事》；有的从研究、学术角度而写，如礼文撰写的《中药“龙骨”——甲骨文的早期搜集与流传》；有的趣味性浓、可读性强，如负献德撰写的《韩陵传说五则》，等等。总之，此书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让文史资料真正起到述史，惠及后世，荫庇子孙的作用，服务改革，服务现代化建设。

让历史告诉未来。诚如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强调的：“文史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使人们了解和掌握许多不太被人重视的史实。”相信今后我县文史工作必将更上一层楼，必将编出更富有地方特色的好书来，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为目标，努力为服务安阳县、建设安阳县、振兴安阳县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2 年 10 月

搞好文史工作
服务经济建设

张保香

二〇〇一·十

安阳市人民政府县长张保香同志题词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张奎堂

一〇〇一·十一

政协安阳县委员会主席张奎堂同志题词

目 录

地质学家郭文魁	吕何生(1)
敌工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史存玺(5)
我印象中的李先念和皮定钧	袁金和口述 牛化法整理(18)
我县公安战线早期领导人——杨健三同志	史存玺整理(22)
从长工到革命领导干部	史纯溪(27)
张怡秋其人	刘书文(31)
从小学校长到革命战士	吕何生(48)
我从事情报和交通工作的回忆	冀宏量(51)
对牛县长往事的回忆	张振海(58)
记王觉民同志	孙有来(70)
刘刚华革命传略	张从凤 刘名扬(75)
冀三聘共产党员考	张辰水(87)
郭有义与“集总”安阳情报组	南 山(89)
牛子明与三十八军始末	张从凤 张振海(94)
峥嵘岁月	王有勇(105)
袁世凯及其家丁祸害安阳民众的几件事	张庆云(115)
关于马恒谷其人	王革勋(120)
汉奸李台之死	宋瑞平整理(123)
记杀人魔王程道生	赵治锦 宋治顺供稿(129)
许三礼妙对补官	耿永德(139)
一代儒医——王瑄	王培栖(141)
关于中苏两件事	王革勋(144)
从一幅日本军用地图谈起	王革勋(146)

解放前夕的彰德中学	张星桥(148)
袁府和袁林	秦文学(150)
韩陵传说五则	贡献德(152)
安阳城址名源古今考	王革勋(158)
中药“龙骨”——甲骨文的早期搜集与流传	礼文(161)
安阳的劝戒烟酒公所	陶希明(175)
第一次打安阳	孟广文(177)
第二次打安阳	孟广文(186)
第三次打安阳	孟广文(200)
略谈解放崔家桥	张辰水(221)
城工部轶事	郭静安整理(227)
抗战时期安阳东部的读书会	李致中、刘书文整理(232)
血战北曲沟	孙有来(243)
日军在安阳推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翔实(250)
日伪时期安阳学生反毒化斗争	郭团沙(266)
乔装“老八路” 保卫珍珠泉	郭新法(274)

地质学家郭文魁

吕何生

郭文魁，字光甫，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1915年6月18日郭文魁出生于河南安阳县太平庄村（今属安丰乡）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先后在磁县第一完小和安阳县一完小读书。1928年至1930年就读于省立安阳第十一中学。1930年到北平第二中学高中部学习。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校成绩优秀，得到李四光、丁文江、谢家荣诸教授的赏识。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7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抗战爆发后，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940年调入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在此后的几年间，他的足迹踏遍滇东北和川西南的大片地区，对该地区的地质和矿产情况进行了大量调查工作。首次发现滇北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及其中的铁矿层，确定了威宁弧，提出了迤东运动和曲靖运动，从而奠定了滇东北的构造格架。他详细研究了四川的红层、第四纪冰川，首次发现了硬石膏，并指出其对油气的屏蔽作用；论证了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矿床的结晶分异堆积成因。1945年奉派由重庆赴美国实习深造，在轮船上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先后在美国联邦地质调查所和明尼苏达大学进修金属矿床学和岩石学，并在美国联邦垦务局实习水坝工程地质。在留学即将结束时，有家资本集团拟往中国开发长江三峡，经营水电，得知郭文魁对三峡地质素有研究，想聘他参与其事。郭文魁不为所动，毅然拒绝。1947年9月回国后仍供职于矿产测勘处。

1948年他发现了灌县马豆子铜矿并正确地阐明其冷水交代成因。他还从事过石油地质和工程地质研究，40年代留美期间，即提出三峡大坝要尽量选择结晶岩坝址的明确意见，得到了建国后三峡工程实践的检验。

新中国成立后，郭文魁历任地质部321地质队队长、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有色金属处副处长、资源计划司总工程师，地质科学院区域地质和成矿规律研究室主任。1964年任地质部矿床地质研究所所长。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对我国有色金属矿床的分布规律、成矿条件、找矿方向、金属矿化作用和分带以及区域成矿理论，做了长期、多方面的系统探索，为我国成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成果后来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他把我国金属成矿作用划分为三大成矿域和三大成矿旋回；提出中国大陆以东西向古中国地台为中轴分别向华北和西南增长，由均衡作用为主，导致大陆隆起和凹陷相伴而生的新见解；提出了金属成矿的渗浸作用、注浸作用以及类花岗岩与成矿作用关系的独特看法。

1965年，郭文魁亲赴长江中下游东乡铜矿研究队蹲点，进行具体的指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在野外工作达半年以上，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文革”期间，他以还没有完全“解放”的身份，参与华东宁芜地区火山岩铁（铜）矿床联合研究队的科技攻关项目（他的具体工作地点是在马鞍山地区）。他对工作非常认真仔细，一丝不苟，每天一大早就出去，直到晚上方才回来。对重要钻孔的岩心，有时他要详细观察、记录好几天，使地质队的同志深受感动。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郭文魁被任命为地质矿产部地质研究所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长期指导和领导了对全国金属矿床区域成矿规律的综合研究，先后指导编制和主编了1:300万中国有色金属成矿规律略图、1:

100万中国成矿规律图和1：400万中国内生金属成矿图。前两种成矿规律图与其它地质图件一起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后一种金属成矿图连同他亲笔撰写的说明书（即该图《导论》）获1987年地矿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985年后他主持编制1：500万石油、煤、金属与非金属成矿图，以多学科交叉渗透方式，综合论证成矿特征与规律性，是国内创举，国外鲜见。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郭文魁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年逾七旬还率领地矿部专家组赴海南进行科学考察，出任地矿部“八五”重点项目中国东部构造岩浆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和首席科学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90年后，他从事痕量元素稀土元素与成矿作用关系的研究，发现中国矿区岩石 k/Rb 与 Rb/sr 比值，同世界上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经典著作大不相同，可作为有意义的找矿标志。

郭文魁从事地质事业长达60余年，学风严谨，注重实践，强调野外工作和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对矿床研究，主张点上解剖，由点到面，既要钻进去，又要钻出来。也就是说，要从一个具体矿床做起，工作从头做到底。但又不限于某一具体矿床，要由一个矿床扩大到更大的区域，更多的矿床。他说：“从实际出发得出结论，总是有其正确性的。”他重视参加实践，自己身体力行，始终如一。他对青年人言传身教，关怀备至。要他们打下扎实的基础知识，多到野外实践中去锻炼，为他们的成长铺路搭桥，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级科技人才。他尊重不同学术观点的前辈和同事，博采众长，不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于人或压制不同意见，从不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工作，影响与其他同志的关系，表现了可贵的学术民主作风。

郭文魁曾多次率中国地质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的学术兼职有：中国地质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北京地质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常务理事、

《地质论评》主编、国际矿床成因协会矿床构造委员会成员、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等。

1999年9月16日，郭文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附记]

1986年3月，笔者曾去北京访问郭文魁先生。如今先生业已去世，这是我国地质科学事业的一大损失。谨撰此文，以作纪念，并向提供资料的郭先生的夫人张卿云女士及张万钧同志表示谢意。

敌工战线上的优秀战士

——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士方

史存玺

岁月迈进了新世纪的门槛。回首往事，自然会想起那些为国为民而英勇奋斗的前辈们。原河南省体委领导人任士方同志就是常常令人深切怀念的一位。

(一)

任士方，曾用名方振亚、方琳，1921年7月出生于河南省安阳县城内东冠带巷一户大家庭里。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9年秋入安阳县第一完小读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地下党发动广大师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他常在周会上听到老师们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说。他和同学们一样争相传阅中共彰德区委编办的《儿童新报》。校园里到处传唱着《松花江上》、《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他在参加这些活动中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启蒙教育，幼小心灵里萌生了忧国忧民意识，开始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五十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五年级课堂上，级任老师吕孝先（吕元忠，革命互济会会员）将课本丢在讲台上，向学生朗读《儿童新报》。

读到一篇呼唤民众抗列强宰割的文章《怒吼吧，中国！》时，吕先生义愤填膺、满腔激清。全班同学热血沸腾、声泪俱下。救国救民的志向从此在他的心中扎下根。他说：“我在第一完小受到革命启蒙教育，《儿童新报》成为我必不可少的读物，对我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的影响。”

1935年夏，任士方小学毕业考入斌英中学读书。是年冬，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反帝运动。安阳各校师生群起响应。斌英中学是一所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但广大学生爱国热情高涨。他和同学们不顾校方阻拦参加了在大院街广场举行的声援大会和示威游行。高呼：“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得到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立志报国的信念更加坚定。

这年冬季一场大雪过后，同学们都在校园里堆雪人打雪仗。几个外国牧师也加入进来。同学们对这些一向自视优越蔑视中国人的洋人早不满于心，不约而同地将雪球团得又大又硬，然后集中向他们投去。一位狄牧师恼羞成怒，恶语伤人。同学们不甘受辱与他理论，双方遂发生争吵以至殴打。使这位洋大人斯文扫地十分狼狈。事后，任士方等受到校长邵贡生训斥，但总算出了一口闷气，让洋人们体会一下中国人并不那么容易受人摆布。此后不久，他愤而离开斌英中学转到省立安阳第十一中学继续学业。

(二)

1937年冬，日军侵占安阳。任士方同家人一度避难临颖县，由于生活难以维持，于1938年春返回。在城外得到消息，自家宅院被日本鬼子占用，只得先到城东东瓦亭村舅父家暂住。

亡国奴的厄运使他焦急万分，日夜不安。脑子里时常涌现出古人的名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耳边时常振荡起在学校里

唱的歌曲：“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国家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丧。看吧！一片片国土在沦亡。……”现在这种悲惨状况降临到自己头上了。绝不能当亡国奴！一定要“担负起国家的兴亡”，去寻找救国的道路。他一面带着几个兄弟在私塾里读书，一面等待时机和思索适当的办法。

1938年冬，表兄王魁升（王汉华）从黄河南逃难归来，谈起在外边的见闻，说许多青年对国民党焦土抗战政策非常不满，向往延安。几天后，魁升在大公中学的同学、前崇义村的常存仁（孙日新）来看望他，士方在一旁陪同接待。常存仁悄悄告诉他们，事变后他随学校南迁，几经周折到了陕西省三原县云阳镇安吴堡，参加了抗日青年训练班（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派回豫北敌后活动。接着又讲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内容。任士方听后茅塞顿开，思想豁然明朗。从此不再到私塾吟诵古文，每天藏到楼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常存仁带来的《论持久战》、《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和《思想方法论》等革命书刊，思想认识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他懂得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实质及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从而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精神大振，苦闷一扫而空。

1939年5月，为帮助更多青年阅读抗日书报，常存仁与王魁升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任士方积极参加，不仅在东瓦亭村私塾里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而且到白壁、崇固、大寒等村联络青年朋友，讨论交流读书心得，传播抗日救国道理。还按照常存仁的安排参加了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如散发传单、办《读书月刊》、分送《新华日报》等。

1940年春，主管敌占区工作的中共安阳县工委成立。工委委员杨天生来到城东敌占区工作。这时王魁升已离家前往林县。任士方的舅父王受益战前任过安阳县二区区长，同情青年们的爱

国行动。他利用舅父的影响和西瓦亭村读书会员张栋一起做通了东、西瓦亭两村主要人的工作，成立了一所文化补习学校，由村上出面聘杨天生来教书，以此为掩护安置了下来。学生多数为东、西瓦亭村人，约二三十个。其中有部分读书会会员。杨天生，原名吕东滨，化名王志富，山西省交城县人，战前就读于东北大学，在救亡运动中入党。事变后在山西太谷打游击，后调任赵谭支队团政治处主任。他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他来后不久就察觉前段活动方法易于暴露，经与孙日新、王遇贤（王实克）研究，为保存实力，停止了开心得交流会和办《读书月刊》等活动。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学校，通过讲授文化历史知识，培养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感。晚上则辅导任士方、张栋几位有一定思想基础的读书会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讲一些敌占区的工作方法、策略、纪律和应变措施等。经过几个月的学习，任士方思想觉悟大为提高，确立了革命人生观，在当年7月经杨天生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之后，他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在杨天生具体指导下做些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以走亲访友方式联络一些农村青年，帮助他们看清时局，解除苦闷，识破敌伪本性，不受敌伪欺骗利诱，其中有的后来也走上了抗日救国道路。他还主动接触爱国士绅刘步洲（长兄任士元的岳父，战前一区区长，在西羊店避难），向刘讲党的团结抗日主张，送《新华日报》给他看，争取他同情和支持青年们的抗日爱国活动。后来，刘得知当地伪军头目对杨天生产生了怀疑，马上将此消息说给了任士方，使杨天生得以从容应付，转危为安。经过这一段的实际锻炼，任士方的观察能力、分析能力、活动能力很快提高，为日后的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

(三)

杨天生在1940年秋季学校放假时返回抗日根据地，不久出任中共安阳县委书记，着手筹建县委和政府机关。因急需干部，他指示仍在城东的地下工作者常存仁、王遇贤动员抗日青年到根据地工作。任士方十分高兴，参加抗日救国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他不顾家人劝阻毅然在1941年1月28日（农历辛巳年正月初二）早晨离开东瓦亭村踏上征程。当家人煮熟饺子到处喊他吃饭时，他已走出好几里路了。在王遇贤护送下，任士方身着长袍、手提礼品、扮作走亲戚拜年模样走在来往行人中，于傍晚到达北岭孙家岗梁辑五（王遇贤在赵谭支队的同事）家。第二天由当地地方团队派人送到抗日根据地卜居头村，受到了杨天生等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这次先后上山的原城东读书会成员有十三人。经过一周学习后，几位年龄尚小的送到太行联中读书，其他都根据情况分配到县区机关工作。

任士方被分配到县公安局担任秘书，同年8月调任县委秘书。战争年代机关人手很少，文秘、后勤、警卫、交通等项工作都由他担负。这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敌人搞“强化治安运动”，对根据地实行封锁、扫荡和三光政策，给抗日军民造成严重困难。他常为筹办机关人员的口粮、衣被和牲口饲料大费周折。一次为给县公安局战士制备军衣，想了许多办法搞到了白坯布却找不到颜料，只好上山刮黄石头面勉强代用。同时，他还和机关同志一起积极参加反封锁反扫荡，平封锁沟，破坏公路，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抢收抢打和征收公粮。在艰险环境和繁重任务面前，他始终斗志昂扬，争挑重担，经受了战争考验，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四)

1943年元月，任士方去中共五地委参加整风学习，结束后调到地委敌工部工作（住磁县西部白土村）。部长杨珏征求他的意见，想派他打入安阳城内做潜伏工作。他深知到敌人窝里比根据地危险得多，随时有生命危险，但仍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决定。数日后他秘密越过封锁线进入敌占区，先到南流寺村与接头人韩俊峰（韩喜昌）碰了面，然后回到离开两年多的东瓦亭村舅父家。在这里他了解了城关敌伪情况，制作了良民证，做了些必要的准备，相机进入城内，设法谋取掩护职业。不久，通过父亲任葆宸生前一位老同事的推荐，他担任了马号街师范附小的教员，从而开始了六年多的地下工作。

由于他的职业在教育界，上级确定他的任务是搞学运工作。当时敌工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他在隐蔽埋伏的前提下慎重稳步地积蓄力量，注意通过社会关系选择朋友，在朋友中培养工作关系，经过长时间实际考验具备条件的发展为党员。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多时间里，他利用当时社会上风行的拜把子习俗，在本校和一、二完小、北门西小学、铁路小学教员中以及师范学生中结交朋友二十多人，从中发展工作关系十多人。通过这些朋友，他了解到许多情况，如敌伪在教育界的组织机构，奴化毒化政策实施情况，伪组织新民会、反共班、情报委员会情况等，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情报报告给上级机关。他还通过这些朋友将党的团结抗日主张、时局真相传播出去，使敌占区群众识破日伪欺骗宣传，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在此过程中发展了两名党员。